

离岸服务外包承接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刘 艳

摘 要:本文在现有研究和相关理论基础之上,选取了5个影响发展中国家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主要因素,并利用23个主要接包国的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一国人力资本禀赋越丰富、经济自由度越高、IT基础设施水平越完善,语言文化与欧美等主要发包国越接近,其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能力越强。考虑到服务提供的质量,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在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方面具有优势。

关键词: 离岸服务外包; 劳动力成本; 经济自由度; IT基础设施

中图分类号: F75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894(2010)01-0010-08

一、引 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达国家制造业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之后,服务业开始大规模向外转移,离岸服务外包是其转移的重要方式。所谓离岸服务外包(offshore services outsourcing, OSO),是指跨国公司(或机构)将本来自身执行的一些服务生产职能,通过建立可控制的离岸中心或国外分公司,或通过合同方式发包、分包或转包给本企业之外的境外服务提供者,以提高自身的资源配置效率。这种服务业务转移方式是对传统国际贸易的重大突破,具有革命性,使得传统意义上难以贸易的服务变得也可以跨国界贸易。

目前国内外对于离岸服务外包颇为关注。国外文献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两个方面,一是以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分析离岸服务外包的发生机制和产生原因。多数研究是从技术进步和制度演变的层面来解释,即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和全球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等因素促使跨国公司把一些服务业务或流程离岸外包,以降低成本、获取境外优质人力资源、提高核心能力和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等。如Jone和Kierzkowski(1990)指出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比较优势差异以及生产过程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推动了生产分散化的进程。^[1]Arndt(1997)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把分段生产的假设加入“要素比例”理论,证明进口竞争部门可以把具有比较劣势的生产环节或流程外包出去,会提高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2]Christina Costa(2001)认为服务外包的动因是成本降低、技术因素以及关注核心能力。^[3]二是把国际贸易理论与企业理论相结合,研究企业如何选择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和供应商地点。Grossman

收稿日期: 2009-10-16

基金项目: 广东省科技厅课题(2007B080703005/07)。

作者简介: 刘艳(1978-),女,湖南益阳人,广东金融学院经贸系讲师,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和 Helpman(2002, 2003, 2005)连续建立一系列模型来解释企业的外包行为:包括分析企业如何在外包和一体化之间进行选择,企业如何决定外包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进行,企业如何在 FDI 和国际外包之间进行选择等,认为企业的外包决策涉及中间品市场的交易成本,中间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市场的竞争状况等因素,而国际外包则取决于东道国的要素禀赋状况、法律环境、搜寻技术等多种因素。^{[4][5][6]} Antras 和 Helpman(2004, 2006)将 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和 Grossman-Hart-More 的不完全契约模型结合起来,全面分析了生产率水平不同的企业对直接投资、本地一体化、本地和国际外包的选择问题,认为生产率水平不同的企业会选择不同的生产组织和地点,产业特征不同也影响产业内企业对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7][8]}

国外经验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离岸服务外包对美国、西欧等发包国生产率、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一般研究都认为离岸服务外包会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加大工资收入的差距,而对就业的影响就有些争议。Ainiti 和 Shang-Jin Wei(2006)研究发现,离岸服务外包对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服务外包对就业的影响并不太明显。^[9] Crinò Rosario(2007)对西欧的研究发现,服务外包对发包国的生产率产生较大的正向作用,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技能偏向,倾向于增加高技能岗位,减少中低技能岗位。^[10] Feenstra 和 Hanson(1996)以及 Hijzen 等人(2004)使用美国 and 英国产业层面的数据分析国际外包对相对工资及相对劳动需求的影响,发现外包导致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以及相对需求的提高。^{[11][12]}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给东道国带来的就业和技术溢出效应。如王晓红(2008)通过对中国 80 家设计公司的调查研究,证明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能够带来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13] 刘绍坚(2008)研究发现,我国企业承接国际软件外包获得了技术溢出的效应,提升了本土软件研发能力,而在技术外溢的多种可能途径中,跨国公司的示范效应最显著。^[14] 任志成、张二震(2008)分析指出,承接服务外包可以促进东道国就业扩张以及劳动者的薪酬提高和技能升级。二是从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现状出发,提出促进中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政策思路。^[15] 卢峰(2007)在考察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认识过程和发展现状基础上,从发展路径选择、硬件和人才基础条件、政策调整滞后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相对落后根源。^[16] 裴瑛(2007)对服务外包中发包方选择接包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低成本及富有才干的人才优势、知识产权的良好保护等是服务外包发包方所考虑的主要因素。

总之,目前国外文献多数是从美国、西欧等发包国视角研究离岸服务外包问题,以发展中国家和承接国为视角探讨离岸服务外包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国内学者主要是强调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重要性,提出一些促进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政策思路,背后的机理分析不够,也缺乏规范的实证研究。本文在现有研究和相关理论基础上,选取了 5 个主要影响东道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能力的因素,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对这些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试图找到提高我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能力的着力点。

二、主要影响因素和假设

在现有研究和相关理论基础上,本文选取 5 个影响发展中国家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主要因素来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假设。

1. 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成本是服务业需要支付的主要成本, 服务业也是人力资本投入最高的行业。因而与制造业相比, 劳动力成本的节约对于推动服务业离岸外包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离岸服务外包的最初动因就是为了利用不同国家之间熟练劳动力的成本差异, 进行全球劳动力套利。因此在技术和其他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发包国把不同服务活动拆分到发展中国家进行, 以节省成本获得比较优势利益。

假设1: 一国劳动力成本越低, 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能力越强。

2. 人力资本禀赋 企业在离岸服务外包的区位选择中, 为保证服务提供的质量, 非常关注当地服务人员的素质。由于服务的异质性和不可存储性, 在服务提供过程中必须要有人员的参与, 而且缺乏机械标准化生产来确保质量的可行性, 服务质量往往依赖于服务人员的水平。因此, 服务人员技术、沟通和管理水平在服务业务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目前, 许多企业外包的服务活动已从最基础低层次的呼叫中心业务逐渐向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IT系统运营服务转移。这种发展趋势提高了对承接国服务能力的要求, 高技术含量、高层次的服务活动需要具有高素质的人才来提供。因此, 承接国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禀赋将会影响到企业服务离岸外包的区位选择。

假设2: 一国高素质人力资本禀赋越丰富, 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能力越强。

3. 经济自由度 根据Dunning(2001)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企业所选择的区位要与他们的优势资产形成最佳搭配, 主要包括要素成本和运输成本、市场规模和特征、政府政策以及文化差异等因素。^[17]一般来说,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 市场经济制度越完备, 交易成本越低, 价格机制越有效, 政府干预经济的政治风险也越小, 就越能吸引外资进入或进行项目外包。

与其他产业相比较而言, 服务业在更大程度上是Clague等(1999)所说的“契约密集型产业”, 即服务业的生产和交易将涉及到更为密集和复杂的契约安排。^[18]作为一种契约密集型产业, 服务业发展更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提供保护, 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对制度的投入相对制造业比较敏感。普通的制造过程所依赖的技术、知识基本上都是属于成熟、显性、可编码和可学习的, 而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对知识产权和长期积累的各种隐含性知识保护的要求非常严格。因此, 服务业这些独特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其跨国公司在对外投资或项目外包时更依赖于东道国的市场经济环境。无论是服务业直接投资还是项目外包, 跨国公司都非常重视一国的商业环境、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方面的因素对企业运行成本的影响。跨国资本出于利益考虑, 决不会把其花费了巨额投资的技术和诀窍, 贸然转移到一个对知识产权保护不严格、对模仿行为处置不严厉国家和地区。江小涓(2008)就明确指出, 与制造外包不同, 限制服务外包发展的不是技术和市场需求, 而是能够将服务外包中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要求体现在合约中并被有效执行的能力, 这涉及合同订立与执行的宏观制度环境, 包括监管模式、法律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19]Altomonte和Bonassi(2004)也认为东道国市场的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 契约的完备性越好, 如更完善的法律环境, 跨国企业发包到该国市场的可能性就越大, 进入该国市场的外包企业就越多。^[20]

假设3: 一国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 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能力越强。

4. IT基础设施 从相关基础设施条件角度看, 当代服务外包建立在IT技术基础上, 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条件有较大依赖。事实上, 大部分类型的服务外包都需要借助信息技术来完成, 如果不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打破了部分服务产品不可转移的特性, 服务外包根本无法

完成。尤其在IT服务离岸外包上,IT基础设施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承接企业IT服务的提供能力和IT服务质量。为保证承包商所提供的服务能够达到发包企业的要求,发包商往往会选择具有较好服务设施水平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外包服务活动。此外,东道国良好的IT基础设施也会通过降低发包方寻找服务供应商的搜寻成本,提高搜寻成功的可能性,从而有利于吸引离岸服务外包。如Grossman和Helpman(2002)指出,企业在如何决定外包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进行时,首先要搜寻具有专门知识的供应商,而搜寻技术影响搜寻成本和搜寻的成功率。^[4]而通讯和运输等基础设施越好的国家搜寻成本越低以及搜寻成功的可能性越大,承接离岸外包的竞争力越强。

假设4:一国信息基础设施越完善,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能力越强。

5. 语言文化因素 国家之间语言文化差距越大,企业离岸服务外包活动将会付出更多额外成本,例如信息交流、业务沟通成本等。因此,为保障外包活动的顺利开展,发包方在选择合作伙伴时需要充分考虑两国间文化差距的影响,并对此做好相应的应对准备,以适应和了解双方的语言文化差距。一般来说,接包国在语言文化方面与目标客户越接近,越具有较强的客户互动技能。由于欧美等主要发包国是英语国家,因此较高的英语水平以及良好的语言文化环境可以使接包方工作人员能够很通畅地与发包方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与协作。交流的有效性取决于语言技能、交流基础设施和文化适应性,能力缺乏、层次较低的交流技能最终会损害客户的信任,从而难以获得海外客户的外包订单。而且,即便获得了海外订单,交流技能的缺乏也会增加人事管理难度,延长项目时间,进而产生较高交易费用。

假设5:一国语言文化与欧美等发包国越接近,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能力越强。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选择

为检验以上提出的假设,我们构建了以下基本的计量模型:

$$\ln \text{OSO}_{it} = \beta_0 + \beta_1 \text{WAGE}_{it} + \beta_2 \ln \text{TER}_{it} + \beta_3 \text{EFW}_{it} + \beta_4 \ln \text{INT}_{it} + \beta_5 \text{ENG}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i*和*t*分别表示国家和时间, ε_{it} 为误差项, $\beta_0, \beta_1, \beta_2, \beta_3, \beta_4, \beta_5$ 为待估系数。为改善模型拟合和减少异方差,我们对被解释变量OSO与解释变量WAGE和TER分别取对数。本文选取2000~2006年为样本区间,采用《2005全球外包报告》中列举的31个主要服务外包承接国作为研究对象,但由于部分国家的相关数据无法获得,我们的样本只包含23个国家,主要为发展中国家。^[22]

OSO是一国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和商务服务的出口价值之和,用来衡量一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总量,^①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账户。

WAGE是各国平均劳动力工资,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动组织的劳动力成本数据库。由于国际劳动组织的各国劳动力工资是以各国本地货币表示,因此,本文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数据库的各国货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价,把各国劳动力工资统一折算成美元。

TER是各国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禀赋。服务业是典型的熟练劳动力和高教育水平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一国承接服务外包的比较优势在于其拥有的熟练劳动力和高素质劳动力的总量。由于无法得到每个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总数,我们以当前各国高等学校中的在校人数作为人力资本禀赋的代理变量,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育统计报告数据中的各国高等教育注册人数。

E F W 是各国的经济自由度指数, 本文选取国际著名的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指数进行度量,^②该指标使用了38个组成部分及子组成部分衡量关系经济自由度的五大因素, 包括政府规模、社会法规和财产权保护、货币的安全性、国际兑换和管制, 以此汇总成EFW指标。该指数值与经济自由度正相关, 指数值的范围为0~10, 指数越大, 表示一国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

INT是各国的IT基础设施水平,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ex数据库的各国互联网用户数据。ENG是语言文化虚拟变量, 如果一国的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是英语, 取值为1, 否则取值为0。

四、计量分析结果

运用面板数据面临着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问题, 两种模型进行计量后的结果差异可能非常大。我们首先不考虑语言虚拟变量ENG, 对以上模型分别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方法进行回归。然后我们加入语言虚拟变量, 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③计量分析软件为EViews6.0, 结果见表1。

表1 离岸服务外包承接能力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1)固定效应	(2)随机效应	(3)随机效应
lnWAGE	0.371*** (4.184)	0.327*** (3.774)	0.317*** (3.736)
lnTER	1.105*** (8.334)	1.002*** (5.644)	0.991*** (5.810)
EFW	0.505*** (5.291)	0.618*** (5.371)	0.610*** (5.320)
INT	0.023*** (6.805)	0.026*** (5.519)	0.026*** (5.626)
ENG			1.863** (2.252)
Adjusted R ²	0.988	0.711	0.714
F值	529.555	99.425	81.015

注: 表中上角标***, **, * 分别表示系数在1%, 5%,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lnWAGE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 表明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国家在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方面有优势, 这与前文提出的假设1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本文的样本主要为发展中国家, 其劳动力成本相对欧美等发包国而言都是较低的, 但由于服务离岸外包对低成本的寻求是要在确保服务质量不变的前提下, 因此企业在进行服务离岸外包的区位决策时, 更多地依赖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为高质量、高水平服务所提供的有力保障。因此, 在同等条件下, 企业在选择理想的服务外包承接地时, 往往愿意选择劳动力成本稍高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应较高服务质量能得到较好保证的国家。也就是说, 只要一国劳动力成本与发包国比较而言相对较低, 即可成为理想的服务离岸外包承接地, 并非劳动力成本越低越有优势。

回归结果清晰地表明, 一国高素质人力资本禀赋(lnTER)对一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

的能力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这与本文提出的假设2基本相符。服务业是典型的熟练劳动力和高教育水平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企业在离岸服务外包的区位选择中,为保证服务提供的质量,非常关注当地服务人员的素质。

经济自由度(EFW)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显著,表明一国的经济自由化程度对承接离岸服务外包能力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这与前文的假设3一致。服务业的生产和交易将涉及到更为密集和复杂的契约安排,作为一种契约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发展更加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提供保护。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市场经济制度越完备,就越能吸引跨国公司在该国建立可控制的离岸服务中心或进行项目外包。

一国IT基础设施(INT)对东道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能力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假设4得到验证,表明东道国IT基础设施越完善,越容易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因为IT基础设施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服务承包商的服务提供能力和服务质量。

语言文化虚拟变量ENG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为英语的国家在承接服务离岸外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与前文的假设5一致。由于服务外包的主要发包国如美国、英国等是英语国家,因此,较高的英语水平以及良好的语言文化环境可以使接包方工作人员能够很通畅地与发包方工作人员进行沟通与协作,减少交易费用。

五、结语与建议

在相关理论基础上,参考前人研究成果,本文选取了5个主要影响东道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能力的因素: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本禀赋、经济自由度、IT基础设施和语言文化因素,然后利用26个主要接包国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对以上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1)一国劳动力成本对其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能力产生显著影响,但由于企业在进行服务离岸外包的区位决策时,更多地依赖东道国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为高质量、高水平服务所提供的有力保障,因此在同等条件下,企业在选择理想的服务离岸外包承接地时,往往愿意选择劳动力成本稍高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应较高的国家;(2)一国经济自由度水平越高、高素质人力资本禀赋越丰富、IT基础设施越完善,其承接服务外包的能力越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为英语的国家在承接服务外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过去我国通过积极承接制造外包,成为全球主要的制造中心。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外包从制造环节扩展到服务环节。与制造业相比,现代服务业具有无污染能耗少的特点,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创造就业、产生溢出效应、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等。而在全球服务离岸外包的浪潮中,我国在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方面显然要比印度、爱尔兰等国家落后许多。因此,我们有必要采取措施增强离岸服务外包承接能力,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促进外贸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 改进和完善相关立法和执法,提高经济自由化程度 一国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市场经济制度越完备,越能吸引跨国公司在该国建立可控制的离岸服务中心或进行项目外包。因此我们应加强法制建设,制定并完善中国服务业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逐步提高经济自由化程度,提高离岸服务外包承接能力。

2. 调整人才培养观念,储备承接服务外包的高素质人力资本 虽然我国拥有低人力成本的优势,但从事外包服务行业所需的高级要素和专门要素却比较薄弱,高素质人才紧缺。我

们应加强研究机构、大学同企业间的紧密衔接,建立起有效的高级要素和专门要素的创造机制,努力培养出更多的高级要素人才和专门人才。

3. 以承接日韩服务外包为突破口, 逐步开拓欧美服务外包市场 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与日本、韩国在地理上邻近、文化上相通的优势,积极承接这些国家的服务外包。在承接欧美国国家外包业务方面,我们可以通过鼓励有条件的中国服务企业走出国门,积极开拓国际服务外包市场,承接欧美地区的服务外包业务。

4. 完善 IT 基础设施, 合理降低电信资费 把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看作外向型现代服务部门,建立国际服务外包企业专网,提升企业间跨地区大容量数据传递能力。进一步深化电信体制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理降低电信资费减少承接服务外包以及其他企业运营成本。

(作者单位: 广东金融学院)

注 释:

- ① Ainiti 和 Shang-Jin Wei (2005) 在衡量各国国际服务外包时,就是采用各国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的出口值来测度一国承接离岸(国际)服务外包的数量。Amiti, Mary and Shang-Jin Wei. 2005. Fear of Outsourcing: Is it Justified?[J]. Economic Policy, April issue. 308~348.
- ② 国际上有两大权威机构每年公布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分别为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指数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指数,简称为 IEF 和 EFW。
- ③ 由于虚拟变量 ENG 不随时间变化,因此无法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回归分析。

参考文献:

- [1] Jones, Ronald W. and Kierzkowski, Henryk. The Role of Services in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Jones, Ronald W. and Krueger, Anne 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E. Baldwin, Basil Blackwell, 1990, pp. 31~48.
- [2] Arndt, Sven W. Globalization and the Open Economy[J].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8, 1997, pp. 71~79.
- [3] Christina Cost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 in Australia: a Literature Review[J].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Computer Security 9(5): 213~224 (2001).
- [4] Grossman, Gene M. and Helpman, Elhanan. Integration versus Outsourcing in Industry Equilibrium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1), 2002, pp. 85~121.
- [5] Grossman, Gene M. and Helpman, Elhanan. Outsourcing versus FDI in Industry Equilibrium[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 (2-3), 2003, pp. 317~327.
- [6] Grossman, Gene M. and Helpman, Elhanan. Outsourcing in a Global Economy[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2, 2005, pp. 135~159.
- [7] Antràs, Pol, and Elhanan Helpman. “Global Sourc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 112 (3): 552~80. 2004.
- [8] Antràs, Pol, and Elhanan Helpman. Contractual Frictions and Global Sourcing[R]. NBER Working Paper 12747. 2006.
- [9] Amiti, M. and S. Wei. Service Offshoring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R]. NBER Working Paper 11926, 2006.
- [10] Crinò, R. Skill-Biased Effects of Service Offshoring in Western Europe [R]. ESPRI-Bocconi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205, 2007.

(下转第 72 页)

Economic Integration, Tax Competition and FDI Mobility

— Analysis of Tax Competition between New and Old EU Members

LI Hui

Abstract: This paper follows the framework of tax competition theory developed by Ottaviano (2005), analyzing the tax competition effect on FDI inflow between old EU members and the new EU members. The research has indicate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European market is the main reason for corporate tax competition, statutory corporate tax has no effect on FDI inflow, while effective corporate tax rate play crucial role in attracting FDI.

Key words: tax competition; capital flow; EU

(上接第 16 页)

- [11] Feenstra, Robert C. and Gordon H. Hanson. Globalization, Outsourcing, and Wage Inequali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 (2), 1996, pp. 240~245.
- [12] Hijzen, A., H. Gorg, and R. C. Hine.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the Skill Structure of Labor Demand in the UK[R].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1249. 2004.
- [13] 王晓红. 中国承接国际设计服务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J]. 财贸经济, 2008, (8): 84~89.
- [14] 刘绍坚. 承接国际软件外包的技术外溢效应研究[J]. 经济研究, 2008, (5): 105~115.
- [15] 任志成、张二震.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就业效应[J]. 财贸经济, 2008, (6): 62~66.
- [16] 卢锋. 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问题研究[J]. 经济研究 2007, (9): 49~61.
- [17] Dunning, J.H. The Eclectic (OLI)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Abingdon, 2, 2001.
- [18] Clague. C, Keefer. P, Knack. S and Olson. M. Contract-Intensive Money: Contract Enforcement,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9, pp. 185~211.
- [19] 江小涓. 服务外包: 合约形态变革及其理论蕴意[J]. 经济研究, 2008, (7): 4~10.
- [20] Altomonte & Bonassi. FDI,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Linkages[R]. CESPRI Working Papers 155, 2004.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Ability to Undertake Offshore Services Outsourcing

LIU Yan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ility to undertake offshore services outsourcing (OSO) and the determinants. It empirically asse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factors using panel data with a robust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more human capital, higher extent of economic freedom and better IT infrastructure, have more ability to undertake OSO. Considering the quality of offshoring services,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with higher labor cost have more advantage of undertaking OSO.

Key words: offshore service outsourcing; labor cost; the extent of economic freedom; IT infrastructure